

权力利润变大,官员下海潮渐退?

国家行政学院学者称无论“进出”都应有机制约束

核心提示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官员辞职下海热逐渐退却,专家称这是因为权力的利润比其他利润大得多。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之风松动了私营经济的土壤,由此催生了第一代辞职下海的弄潮儿。这一风潮持续十数年,在90年代初和2000年前后又形成两次爆发,形成中国官员的三次下海潮。

相比前两次辞职下海潮,第三波下海潮更为彻底。这批官员数量众多,和他们的先辈不同,他们大多投身于非公企业。由于市场多年的发育,他们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无疑要比前辈们大得多。

事实上,经过一番市场的洗礼,真正留在民营经济“深海”中的官员依然是少数派。据《投资者报》对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统计,截至2009年末,民企聘用前官员的比重较小,在民企任职的前官员占下海官员总数1599人的比重只有21%。被称为中国税务系统迄今下海最高官的百大集团董事长徐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下海官员和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认同。

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是,辞职下海的官员越来越鲜见,尤其是集中的官员下海潮几乎绝迹。徐刚分析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有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更是直言,官员下海潮的退却是因为“权力的利润比其他利润大得多”。而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不少改革在原地踏步”。

官员辞职下海永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现在这股热潮逐渐退却也耐人寻味。在著名学者、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时和兴看来,不管官员是进来还是出去,都应有机制来约束。

能官能民的人才流动机制正在形成

现代快报:官员辞职下海热逐渐退却,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时和兴:这肯定有历史的原因,不能以绝对数字来比较,因为社会条件肯定是不一样的。当年官员下海,其实也有学者下海,总的来说,这是社会多元的表现,总是进步的。如果像过去一样都挤在一个独木桥上,并不是好事情。再说,市场更需要有活力的人才。

现代快报: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鼓励官员下海,是因为当时政府机关人才过剩,市场人才又奇缺。

时和兴:是啊,原来市场经济没有引入,真正有管理才能的人大量集中在政府部门。随着计划经济的松动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不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功能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源结构也会随之改变。建立了市场经济,官员下海也是人才结构调整的必然。

现代快报: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市场的“空子”小了,不好钻了,所以慢慢的官员又不愿下去了。

时和兴:中国在文化传统上是个关系社会,在市场刚刚形成的阶段,有些下海的人可能关系

比较多,人脉比较广,能够为经商提供一些便利。然而,随着市场机制逐步走向规范,人脉关系的作用就会逐渐受到限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官员钻所谓的“空子”,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化、规范化的经济。另外也要看到,现在不愿下去也可能有全球金融危机对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因素在起作用。

现代快报:如果官员都不大愿意下海了,是不是这种“多元”的局面就不保了呢?

时和兴:“下海”和“上来”这种反复,实际上也反映一种能官能民的现代人才流动机制正在形成。不管往哪个方向流,有流动就不见得是坏事,关键是流动过程要避免利益冲突。回过头来再说“关系学”,如果说“下海”和“上来”都是因为关系问题,那么这个市场是非常可怕的,其结果也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多元。所以,市场经济必须和法治紧密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现在正在推展的官员财产申报是件好事情。不管你是进来还是出去,都应有处理利益冲突的良好机制来进行约束。

你出去后再进来,这里面会不会也带来一些利益冲突,这也是需要考量到的。

现代快报:2009年7月,《公务员辞去公职办法》出台,规定公务员离职前必须审计。

时和兴:离职审计当然必要,但主要是对其职务本身进行审计。其实,公私利益关系冲突还远不仅仅是职务本身的问题,包括其他有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各种潜在利益冲突。管理利益冲突应该把这些都包括在内,国外在这方面有不少有益的经验。我们强调财产申报仅仅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对于进来的和在任的公务员来说申报是重要的,但是走时光靠申报也是不行的,潜在利益也要考虑在内。离职时的整个利益冲突关系管理是很重要的。

对下海官员经济补偿值得商榷

现代快报:在官员辞职下海的经济补偿方面,各地并不统一,比如说前几年,重庆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对官员辞职下海不予补偿,而2008年,河南商丘专门制定了经济补偿政策用以鼓励官员下海。

时和兴:原来很多地方都在鼓励官员下海,这个事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有些辞职下海的官员会把原来的关系带走,而有些关系是借用公共利益,是通过公共权力来实现一些东西,就有可能把公共利益用于企业或个人利益。如果从管理利益冲突的视角看,官员下海应该是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我们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法律尤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补偿鼓励官

员下海,是有悖于公共利益的。毕竟他下海之后从事的不是公共活动,而补贴肯定是拿着公共财政来补贴的。

现代快报:现在很多高学历的人才都想往政府部门挤,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仅仅是“官本位”的诱导吗?

时和兴:也不能因为官员都回来了,或者说不愿意下去了,就认为是完全不好的。国外曾经有一种说法,一流的管理人才在企业,二流的人才做研究,三流的人才进政府。从人才战略的角度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如果你吸引不到高层次人才,显然公共人力资源就会是匮乏的,这和政府所承担的任务及其地位也是不相称的。所以我国也需要吸引一些人才到公共部门来从事公共管理。从这个角度说,能吸引到人才到公共部门,也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如果全社会都是单一地追逐这一领域,那就不见了。我们还要改变零和思维模式,即以公共部门吸引了优秀人才,市场的人才就没了,或者反之。在我看来,未来的人才流动要打破零和博弈,不是说哪个地方一定有一流人才,而是说哪个地方都应该有一流的人才。人才的流动是很正常的,不能一看见人才往哪流了就觉得奇怪了。关键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伦理氛围,不管人才是在哪个部门工作,都需要一个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机制。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北大清华比状元,全国人民都笑了

北京大学对外宣称,今年全国各省份文理科第一名中,除两成报考香港高校外,六成以上被北大录取。

按此说法,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其他高校,只招揽到了不到两成的高考状元。对此,清华大学马上予以还击,称今年九成省份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省份的文科第一名填报清华,清华招揽的高考状元总数连续第四年位列全国高校榜首。

(7月20日《新京报》)

两所国内一流高等学府拉下脸皮掐架,你说你招的状元多,我说我招的状元多,两边招揽的状元加起来,比全国的高考状元总数多得多。数据打架是显而易见的,是否存在数据造假也让人怀疑。如果是经济数据打架,我

们会急切地想弄清真相,但对于状元数据,亦即北大、清华到底招揽了多少高考状元,很多人可能并不想搞清楚,因为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只是觉得很可笑甚至很丢人。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出炉的高考状元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获得成功,没有多少状元成为拔尖人才。对此,作为每年招收高考状元的“大户”,北大、清华感到惭愧否?不妨想想,你们是怎样把这些极具潜力的高素质学生培养成平庸之辈的?

一个企业买进了更好的原材料,却生产不出更好的产品,肯定是其生产方式、管理水平有问题。同样,一所高校招收到更多的高考状元,却培养不出多少

拔尖人才,肯定是其教育方式、教学水平有问题。当高考状元经由高校培养而沦为平庸之辈,那么比拼谁招收的高考状元多,岂不实际成了比拼谁糟蹋的人才更多?莫非这是一份应该拿出来显摆的荣耀?

当然,北大、清华可能不这么认为:本校招收的高考状元多,说明本校有吸引力,说明本校的教育水平高。

这在逻辑上似乎讲得通,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如何,北大、清华想必清楚得很,你们所谓的教育水平高,不过是相对而言,是“矮子里头选将军”,是低层次的高水平,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夸耀的,要真牛的话,你们跟麻省理工比,跟耶鲁剑桥比,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很

大一部分都投奔这些国外名校去读研,这说明什么?

不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显摆你招了多少高考状元,若要显摆,就显摆一下你培养了多少拔尖人才吧,这才是一所高校真正的荣耀。北大、清华每年四处“掐尖”,甚至不惜以金钱利诱,这种做法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而每年“掐尖”的北大、清华却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对此人们早有怨言,你们却还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掐架比状元,岂不让人笑话?

都说全国人民有状元情结,看来最有状元情结的是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教育部一直强调不要炒作高考状元,那么就请先管好自己直属的名牌高校吧。

(晏扬)

公民发言

围观跳楼讨薪 恐怕不是因为冷漠

“快跳啊,不跳不是英雄。”一名向装修公司讨要工钱的女子站在13层楼高的窗外,楼下众多的围观群众中有人这样冲她喊。有图有真相,那些围观者面带笑容,谈笑风生,有坐着板凳摇着蒲扇的,有站着席地而坐的,还有抱着小孩来的。

(7月20日《重庆商报》)

每当看到这种场面,大家就会指责,这些人大冷漠了,可是,这真的是冷漠的表现吗?

如果那女子真从楼上跳下来,我坚信,现场那些笑脸一定会马上变成悲容,甚至会愤怒得把那欠薪的装修公司砸个稀巴烂。可为什么他们却对着她喊“快跳啊”?很简单,这是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这是一场自杀,而是一场戏,有人把这当戏来演,观众自然把这当戏来看。看戏还不能喊么?看戏还不能笑么?

“戏”的概念不是围观者自发形成的,而是来自于媒体,媒体一直把这种场面当戏来报道,民众久而久之自然就把这当戏来看。再把洋葱剥去一层,这也不是媒体的错,而是跳楼讨薪本身就是主角预谋的戏,他们知道这样才能讨到欠薪。再剥去洋葱一层,这也不是讨薪者的错,他们之所以非演戏不可,是因为许多社会规则都很搞,老板欠薪工会不管,劳动部门不管,法院不管,但只要演戏般站到楼顶上,就都来管了。

说白了,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一场戏,跳楼讨薪者、警察、政府官员、媒体记者、拉安全气囊的消防员等都在热情地演戏或配合着别人演戏,指责热情演戏的群众人性冷漠,那是纯属装傻无知。明知是戏,却要观众当真不准笑,可这要是不是戏,那欠薪的装修公司老板就是逼人自杀的凶手,可长这么大,你见过有欠薪老板因逼人自杀而入狱的么?我没见过啊。(范辉军)

热点纵论

必须曝光去紫金矿业“领退休金”的官员

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19日晚道歉,称愿接受处罚。据悉,紫金矿业16日晚再度发生渗漏。目前粤闽两省跨界水域受污染。

上杭县环保局知情者称,当地官员与紫金矿业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县政界大部分退休官员,成为紫金矿业的抢夺对象,被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另据了解,2009年,紫金矿业对上杭县全部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到近60%,而上杭县去年的财政收入是6.85亿元。

(7月20日《钱江晚报》)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不仅是上杭县,就是市上和省上,那些

曾推动该公司上市的相关官员,很多都在退休后毫不避讳地到“紫金”来发光发热了——到这家“富可敌县”的上市公司拿动辄数十万元的年薪。

不用说,这里面很可能存在着大量“期权腐败”的问题——官员在位时为企业铺路搭桥,退休后就去企业分享利润。

如果一家企业对一地政府的财政贡献可以高至六成,那么,这家企业必然可以在政府大院里闲庭信步,必然说话声如洪钟。如果这么多退休官员到紫金矿业去分一杯羹,那么,企业的管理必然被一群盘根错节的并未失效的权力所掣肘。因为这样

退休官员头上犹存着“红顶”影响力,可能会让调查、问责、追问止步了。

更让人忧虑的是,当前诸如紫金矿业这样的企业并非少数,真正被污染的“全景”是:一方治理八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边治理边破坏……土地、水资源为代表的生态安全受到巨大威胁。最终呈现这样的“怪圈”:未污染之前地方政府不怕污染,见有污染之后再治理,而此时往往已是积“污”难返!在被污染的水系面前,治污所耗用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是空前的。拿淮河治污来说,近年来几百亿真金白银投进江中,几乎连水泡

都没溅起一个。

这一切的背后,往往都有着“红顶”到企业争利的身影,在他们的保护下,污染企业才敢于不把环保法规放在眼里,对污染企业的处罚,也才会动辄变成棉花拳。在这样的合谋之下,“环境为企业发展让路”,就一点也不稀奇了。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痛及骨髓的组合拳出现。比如:应全部公开紫金矿业里的“告老红顶”的名字,追查其间是否存在“期权腐败”的问题。并藉此让大家知道,权力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侵蚀这个社会。(周明华)